

# 从理论与实践论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 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

谭 崇 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发展经济学在其第一阶段含有重工轻农,重物轻人,重计划轻市场和重封闭轻开放等四个特点。影响所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封闭式的、计划指令性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国内资源得不到充分的调动,国内经济不能和国际经济接轨,国民经济低效率运转而缺少活力。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总结教训,提出了把中心点放在从僵硬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下解脱出来、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基本思路。较早地按照这种思路调整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证明了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是我国必由之路。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经济学科,它以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脱胎而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经验教训的累积和总结,这门新兴学科在短短不到半个世纪中在基本思路、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等方面都出现过重大变化,大约以60年代中期为转折点。可以把这一时期之前称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之后称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二阶段。

##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明显地具有下述四个特点:

第一,重工业而轻农业。

强调工业化,农业则被视为一个消极的、受动的部门,它在工业化过程中所能起的作用不过是为工业发展提供所需的资金和劳动力以及为工业品销售提供所需的市场而已。

强调工业化有其理论根据。其一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初级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相比有长期下降趋势,而工业品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由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以代替进口的工业品。其二是联系效应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金有限,为了使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的效益,应当把它投入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即工业部门。因此,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力图工业化。其三是恩格尔法则,认为当人均收入提高时,对食物等必需品的消费支出将相对减少,对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消费支

出将相对增加。舒适品和奢侈品是由工业部门生产的,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工业。除了这些理论根据外,对工业化的热切要求体现着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民族感情。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时期,它们在经济上完全是工业化强国的附庸,宗主国是不容许它们发展工业的。独立之后,它们和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工业化水平的悬殊。历史和现状使人们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自然地联系起来。于是,在50年代,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的首要目标,而农业几乎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部门。

## 第二,重资本形成而轻人力开发。

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家在投入要素中特别突出资本的地位。他们认为,自然资源的丰欠,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如此。劳动一般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充裕的要素,当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发展中国家最感稀缺的是资本。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形成的快慢,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心目中,是促成或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或人力资本形成的观念,在当时是很淡薄的。

## 第三,重计划管理而轻市场机制。

强调计划管理的理论根据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依靠市场——价格机制来发展经济,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论结构上或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缺少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既不及时又不正确,不能灵敏而又如实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正成本,由此可能引起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上社会评估和私人评估的不相一致,如果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就会使现有的和未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从而不能实现社会的、长期的、最大的利益。

不难理解,强调计划管理,也是强调资本形成和强调工业化的必然逻辑结论,因为加速资本形成和决定工业布局与进程都难以依靠经济单位和个人的自发活动和市场——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

## 第四,重内向发展轻对外开放。

前三个特点的存在,必然促成第四个特点的产生。首先,当时强调工业化一般就是强调自力更生的工业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或国家保护的工业化,也就是封闭式的而不是在国际竞争环境中进行的工业化。其次,偏重物质资本的积累而看不见人力资源开发的巨大社会经济效益,就趋向于满足并夸耀物质建设方面的某些成就,而无视教育训练的重要作用,更不重视科学文化的国际交流,固步自封,不放眼世界。而且,既然认为经济运行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就自然倾向于漠视或淡化市场——价格机制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和促进发展的良好作用。

具有上述四个特点的经济发展思想,不仅是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为不少并非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以印度为例,尼赫鲁于1947年任独立以后第一任国家总理时,就任命统计学家马哈兰诺比斯(P·C·Mahalanobis)为计划委员会主席。马哈兰诺比斯根据苏联的费尔德曼(G·A·Feldman)计划模式,制定了印度的两个五年计划。马哈兰诺比斯计划和费尔德曼计划一样,突出第一部类生产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约束,强调对资本品工业的投资,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解决资本品的匮乏问题,认为只要资本品工业发展了,消费品工业和农业就会随之而发展。计划管理和国家控制经济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方针不只为拉美国家所遵循,也成为60年代以前亚洲不少国家和地区谋求经济进步的圭臬。

历史经验证明,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所含思想是有片面性的,以这种畸重畸轻的思想为根据的经济决策,尽管在一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工业体系的初步建成、国民生产总值较快的增长等),但在更多方面产生了后患很深的结果。其主要表现是:农业停滞不前,50年代至60年代的20年间,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粮食生产率和人均农业生产率很低,年增长率都未达到1%,而且60年代的年增长率还低于50年代;市场——价格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企业经营不在竞争条件下运行,进口替代工业效率低,成本高,缺少竞争力,为了维持其生产,必须继续得到保护,以致低效率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持久不能改善;教育落后,职前和职后训练不受重视,从而人民素质提高很慢,生产和管理的技术长期处于低水平;人民生活改善很慢,这是农业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经济效益不高和人力资源得不到开发的必然结果。

总之,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几个基本观点影响之下,不少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封闭式的、计划指令性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国内资源得不到充分的调动,使国内经济不能和国际经济接轨,国民经济是低效率运转的,是缺少活力的。

## 二、第二阶段经济发展思想的重大转变

现实的经验教训迫使经济发展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首先,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工业化速度是以农产品增长为条件的。就农业原料而言,只有当农产品以一个适当的比率提高时,使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部门的增长率的增加才能得到保证。而且,工业化的速度深受粮食供给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边际消费倾向高于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也高得多,加上伴随工业化而出现的城市化扩大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还呈递增的趋势。此外,繁荣的农村是工业产品的广大销售场所,农业部门又是为工业提供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的泉源。而且,农业部门生产的初级产品的出口将创造工业部门所需的外汇,这一点在工业化初期尤为重要。可见,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决非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部门,农业进步与工业进步是息息相关的。在经济发展中,自始至终,农业都必须受到高度的重视而决不可偏废。

其次,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决定一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不仅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的开发在于提高人民的知识和技能,其措施是发展教育和加强训练。教育和训练有两重作用: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和训练后,获得了知识,提高了技能,由此而增加了对工作机会的适应性和在工作中发挥专门才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人们受教育和训练后,可以改变不正确的价值判断,提高纪律性,增强对工作和社会的责任感,由此而促进做好工作的积极性。根据统计分析,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高于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高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而且初等教育投资的社会经济效益高于高等教育。于是,发展教育,普及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这一点逐渐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共识。

再次,从片面强调计划管理转而重视市场机制。经过相当长期的实践,人们逐渐看清了计划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如企业缺少主动性,经营行为没有简单明了的准则,信息渠道不畅通,计划往往脱离实际而又难以及时调整,管理者由于掌握权力而易于腐化等等。与此同时,逐渐认识了市场机制的建立正可以除去这些弊端,从而优化资源的配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更深

层次地阐释市场机制不仅能静态地优化资源配置还能动态地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他们指出,市场机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而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基本教训是,经济增长并不是单纯决定于储蓄和可投资资源的供给,而且主要地决定于如何有效地或生产性地使用这些资源,市场机制的主要因素正是它具有的配置效率,即有效地或生产性地使用资源。从经济发展观点看,值得特别关心的并非是现存资源,而是从不断增长的储蓄和资本积累源源而来的流动资源,由此,建立市场机制以防止资源配置不当就特别重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的种种扭曲会通过它们的累积效应而严重地抑制经济增长。因此,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与动态的、由资本积累而促进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互相联系的。简单地说,市场机制不仅优化资源配置,还有效地促进增长。

最后,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而主张开放性的外向发展,特别在贸易战略上从进口替代转而采取出口鼓励。出口鼓励贸易战略的推行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资源的相对优势,发展适合这种优势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来促进工业基础的加强和整个经济的工业化,并由此增加就业,提高人均收入和改善贸易条件。

### 三、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的中心点

不难看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虽然表现为四个方面,却有一个中心点,即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僵硬的、低效率的、缺少活力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解脱出来,逐步走向市场经济。

在计划管理体制之下,轻视农业,轻视人力资源开发,执着于内向发展,自有其思想渊源。

就对农业的看法而言,唯计划论者认为,工农业两个部门之间不必依赖于市场——价格机制的联系和调节,农业对工业化的支援不过是物资的计划调拨,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民缺少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对经济刺激缺少合乎理性的反馈。唯计划论者不能认识到,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之下,农业对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多重贡献,也不能认识到,农民也是能动的经济主体,是工于计算的“经济人”,他们对经济刺激能作出灵敏的、合乎理性的反馈,他们在计划管理体制下被压抑的商品观念和市场意识,一旦价格机制能够不受障碍地发出信号,就会复苏起来指导他们的经济行为。轻视农业的思想是唯计划论的副产物。

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唯计划思想支配之下,自然也得不到重视。计划制定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物的方面而不在人的方面。按照计划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和编制国民经济的基本方法是平衡法,而平衡法在具体应用时须以国民经济平衡表为工具。平衡表分为两大类:(1)反映国家经济不同侧面的三组平衡表,即物资平衡表、劳动平衡表、财政或货币平衡表;(2)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包括社会产品平衡表、国民收入平衡表、部门间联系平衡表。可见,经济的计划平衡基本上是社会产品、物资、财政、货币的平衡,或者说,基本上是物的平衡,在这些平衡中,人的作用,人的知识和技能的价值看不见了。尽管在工资计划中似乎在贯彻按劳取酬的原则,而事实上分配往往是并不公平的,特权使一些人的实际收入大大高于他们的名义收入,而在夹缝中存活下来的作简单劳动的个体生产者的收入往往超过高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门人才。相反,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存在着受法律制约的正常交换关系,人力资源的价值就能得到实现。人们由于认识到人力资源的宝贵所在,就有不断提高自身质量的积极性,整个社会也随之而不断提高开发人力资源的积极性。人力资源价值的实现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人力资源价值能实现于市场经济之中,并非对人的尊严的损害,相反,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

市场经济的实行,必然也必须由国内向国际延伸。一国不可能以锁国主义的方式搞市场经济。走向市场,就必须迈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必须采行的战略。只有在国际经济大循环中,国内企业才能脱离国家保护的温室,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承受风风雨雨而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扬长避短,取长补短,使自己的经济行为合乎国际通用的准则,按照国际标准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体制下,外资的利用和先进技术的引进,才能有畅通的渠道,才能有利于鉴别取舍。开放的市场经济,不只使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得到对外贸易收益的静态利益,而且由于资金技术的引进和学术文化的交流,又使发展中国家得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动态利益。

#### 四、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必由之路

在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基本思路影响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现实,认识到必须在经济体制上进行重大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确认市场——价格机制不仅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机制,也是有效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以这样的认识为中心,在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兼重农业进步,在累积物质资本的同时兼重人力资源开发,在改革国内经济的同时兼重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总之,针对计划管理体制下的弊端,坚持改革,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应是发展中国家必由之路。在肯定实行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论证中,不少的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市场——价格机制并非是完美无缺的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的自我作用可能使企业走向联合和集中,从而可能形成垄断力量,它们会从价格承受者转变为价格决定者,限制产量,提高价格,谋求超正常利润。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会造成外在经济负效益,以致社会成本高于企业成本,而且,成本渐减的企业价格与产量的决定往往背离最佳配置资源的原则。对这些情况,政府有必要进行适当的干预。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需要庞大的投资,一般企业难以承担,基础设施的效益须经过较长时期之后才能产生,一般企业难以久待,为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政府安排。市场无论多么成熟,市场机制无论运转得多么灵活,总不能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共同富裕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而市场机制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往往是某些地区,少数企业或个人领先的,只有在相当长时间继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才会普惠广大地区和广大人群,收入分配的差距才会渐渐缩小。但是,贫困减轻和普遍富裕是人民企望的目标,它的实现不能旷日持久,为此,政府不能不有所作为。总之,在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必须对国民经济作出必要的宏观调控,但是,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决不意味着回到计划管理的老路而随意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而主要是以财政、金融政策,辅之以法律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必不可少的、合理的调控。

经验证明,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较早地走上这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取得了颇为快速的经济的发展。

以“亚洲四小龙”著称的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就是遵循外向发展、市场调节、重视教育和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的方针而快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典型。以韩国为例,从60年代起,政府把工业化战略从内向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外向的出口鼓励战略,对出口厂商减免关税并给予补贴作为刺激,按照国内外价格变动,调整外汇率,并周期地对货币进行贬值,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抑制了通货膨胀。支持出口和争取完成出口指标的政策不仅是公开宣布的,而且是稳定不变地得到执行的。同时,十分注意劳

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并多方面鼓励他们作出贡献,取得成就,从而培养了有教养、有事业心的和守纪律的劳动队伍,使经济持续增长得到可靠的保证,此外,政府依靠市场机制,特别注意制定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的政策,如纠正价格的扭曲,使其接近于真实成本,提高利息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刺激储蓄。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韩国的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1960年,出口只占GNP的3.3%,以后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至80年代几乎占GNP的50%。制造业总产值中出口的份额,1955年为零,1965年为6%,70年代中期以后,超过40%。以台湾为例,自60年代起,在逐渐减少计划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在产业政策方面,十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先发展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然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拓展对外贸易,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鼓励。重视教育和培训以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的素质。还提高利息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而鼓励储蓄。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台湾经济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从1969年至1987年,人均收入由250美元增长至2000美元,出口以年平均26%的速度增长,外汇储备接近800亿美元。

在亚洲几个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国家,由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序和力度上的差异,其经济进步的速度也曾大有差异。如60年代至7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状况一直不如马来西亚,70年代以后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经济面貌就迅速改观,而缅甸的经济发展水平至今仍远远落后于泰国。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因长期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而造成国民经济缺少活力,社会经济问题丛生,而其中个别国家因能锐意改革,对外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停滞的国民经济便迅速启动并发展起来。墨西哥即是一例,一直到80年代初,它还是个债务大国,民族工业发展缓慢,经济停滞不前。80年代中期,墨西哥政府毅然改变经济政策,转向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正式加入关贸总协定,逐步对货物进口免除许可证手续,平均进口关税率降至20%,还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要求,对国内经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新的方针指引下,墨西哥的经济出现了一派生机,1990年开始恢复正常的经济增长,1992年的增长率达到4%。墨西哥又同美国和加拿大达成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协议,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我国在1978年以前长期实行的是重工轻农、重物轻人、封闭式的计划经济。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比较适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并由此为工业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50年代中期以后20多年的严重挫折表明了它是一个导致经济缺少活力、效率低下、农业落后、人民生活提高很慢的僵化模式。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根本转变,确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并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十几年中,我国沿着这条方针路线,逐步深化了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逐步扩展了改革开放的实践,经济建设、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党的十四大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经验,进一步确认:必须加速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在充分发挥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同时,不忘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保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全力发展教育,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人民素质。显然,这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一个中心点,即必须从传统的计划管理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逐步走向开放型市场经济。

在十四大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我国满怀信心地、坚定不移地走上对外开放、实行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